

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①

温铁军

世纪之交已过10年有余,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都没有如期完成联合国制定、各国领导人签署的“新千年计划”;更吊诡的是:完成了新千年计划的中国却越来越成为西方及其带领的跟从主流话语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攻击的“靶子”!国内外无论是谁只要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就可以凭借其内含的“政治正确”随意敲打中国,而其中以“邯郸学步”自诩主流的中国人甚至恨不自断祖脉。

由此,怎么看待全球二八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就成了慎重地有别于西方主流的中国人能否自觉而有效地把中国经验从特殊论提升到“一般论”的理性高度的重大话语权问题。

于是,今天的题目是全球资本化与制度性致贫。

一、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剧制度性贫困的

首先,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问题意识:随着战后西方产业资本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贫困问题,已经在世纪之交出现了重要的、但为学术界视而不见的结构变化。

一是从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现代化国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难以化解债务危机。因为,虽然世界上的政府负债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负债为主,转变为发达国家政府负债占比高达70%以上;但那些因长期忝踞“先进国家”地位而构建了制度权和话语权的“新债务国”却根本就不会认同他们自己确立的债务国必须接受债权国制度要求的原则——显然都在趾高气扬地赖账,理直气壮地索要债权国“救助”;一度最亮丽的世界主流秩序势必被其构建者“始乱终弃”。

二是从经济上看,越是结构高度化的超现代经济体,基尼系数越高。其中,最发达的现代化美国GDP的85%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其贫富差别超过0.5,大约1/5的人口不得温饱,属于高度现代化条件下拉大贫富差别的典型。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香港特区GDP的80%以上来源于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并且也是基尼系数高于大陆大部分省市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贫困率也高达1/3以上(民间组织认为是1/2),属于贫富差别拉大、贫困问题严重难以缓解的典型国家。同理,如果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或现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来打工者纳入本地贫富差别统计,也会出现基尼系数显著提高的现象。

归纳已发生的经验过程可知,体现“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经济越是高度现代化,产生的贫富差距反而更大。高度现代化与贫富差别拉大这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因果关系,只不过构成这种因果逻辑的变量及其结构尚待验证。

其次,自从华盛顿共识问世,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其规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涵:世界只有20%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白人及其后裔为主)已经进入现代化,其余80%的人口(有色人种为

[收稿日期] 2011-12-20

[作者简介]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2。

①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武广汉根据2011年10月26日温铁军在中国人民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的演讲整理而成,已经温铁军修改审定。

主) 很难再仿效进入现代化。另外的派生内涵是, 因为 20% 的人口享受现代化就已经造成了环境的不可持续, 再让另 80% 的人进入现代化, 地球环境就无法承载了。基于这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共识, 无论中国怎么说和平发展, 人们都不相信。因为如果占世界人口 20% 的华人进入现代化, 就改变了华盛顿共识, 世界二八开这个照搬自然界“黄金分割定律”在人类社会的约束, 就被中国人突破, 变成了四六开。由此可见, 无论中国人是“乖”还是“张”, 西方主流的制度文化都会自发抗拒中国进入现代化。

再次, 当人们讨论全球化的时候, 需知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全球金融化。金融化进程中, 人们都看到的资本化是一个方面, 但资本化的前一个方面是货币化。如同西方当年的重商主义是依托政治强权推进一样, 当代如果没有相当强势的政府印刷出纸币并“赋权”于货币信用的货币化加速过程创造大规模货币增量, 金融资产总量不会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得以大规模扩张, 这种依托政治强权的金融资本不会主导全球的资源资本化, 也就不会有强势占有资源转化收益的工具。因此, 需要分析, 全球化的实质内容从来不是教科书包装的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今天占据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两个增长: 政治强权的增强及其派生的货币化增长和货币大规模增发派生的作为资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长。

而制度性贫困, 则是与这种全球化伴生的成本转嫁与生俱来的。总结我在最近十几年开展国际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 只有 5 个字: 成本转嫁论。亦即, 制度性贫困是承载了不断累积的全球化代价的客观结果。

这是个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的理论创新。从这个客观研究反过去找理论资料的时候, 就找到了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 这属于一个讨论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他提出了“核心—半核心—边缘”的世界体系, 这个基本框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一个理论工具。此外也承袭了萨米尔·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与相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已经属于最具革命性的新制度经济学相比, 这些理论更具革命性和现实性。

制度经济学之具有革命性的原因, 是将微观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过去不纳入的制度甚至文化等基础性因素吸收到经济学框架中了, 虽然其目的是据以强调发展中国的经济转轨; 但毕竟有从“经济脱嵌于社会”内生的幼稚向“经济回嵌社会”的成熟的回归。

制度经济学研究中, 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并且易于被新古典理论体系接受的, 是认为制度变迁产生增量收益。在中国较早用制度学派理论研究改革、并为西方人提出“北京共识”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林毅夫教授。1980 年代林毅夫从海外归来与国内学者合作主持研究项目, 证明了因农村制度变迁创造的农业增产占的比重约为 46%, 此后, 这种“制度收益论”成为中国政治家及经济学家都乐于接受的主流观点。但虽然“有多少收益就必有相对应的成本”只是个基本常识, 却很少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愿意讨论制度成本。

我的实证研究起步于 1980—1990 年代的农村试验区, 按照试验法的原则只能“不断证伪才能接近客观真理”, 这种不断证伪的试验过程最初我只归纳为“制度成本论”。后来, 有机会做更多国际比较研究时才进一步意识到: 发现制度成本并不应该算是我的理论创新; 而发现占有制度变迁收益的利益群体把制度成本不断对下做层级转嫁, 而且也不是不变的, 才应该是我的理论创新。因此修改为“成本转嫁论”。

理论家大都认同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 这个所谓制度性贫困, 其实就是成本不断对弱势群体的转嫁造成的——任何制度变迁都是原有框架内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获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制度成本的过程。

这个理论也逻辑性地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资源环境破坏愈演愈烈。那是因为, 弱势群体至少还可以发声, 但是环境却不能发声, 当弱势群体不断承受累加的制度成本到不能再增加的时候, 成本

就更多地转嫁给了环境。

当我们把这种理论创新引用到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时候,就有了个有意思的说法,我强调指出:制度本身是派生的——这和很多学者的制度决定论是有本质差别的。他们说到各种不良现象的时候,似乎愿意说“都是制度惹的祸”。当然,这使得面对各种劣迹的理论家很容易给社会大众找出解释。但如果愿意深入想,就应该会问:制度是从哪来的?特别是那些所谓现代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是一个向西方现代化努力学习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制度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哲学问题。

我们认为,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而言虽然很短、却破坏很大的历史阶段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三次代价和制度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及其“接轨”。

第一次始于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工业化导致的殖民地扩张——欧洲与中国贸易的长期逆差带来白银危机和白银战争;并通过对外扩张占有资源和市场以及贫困人口(包括罪犯)的大量移出,控制了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引发17~19世纪的大量“以国家为犯罪主体”的殖民战争……同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陆续遭受侵略、大部分被迫纳入宗主国控制的资本主义体系,被拖入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殖民化地缘战略。

第二次始于资本主义中期产业资本的扩张——西方通过殖民地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随即进入19~20世纪的工业化扩张;地缘争夺和生产过剩作为“资本主义内生性的一般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基于1950年代战后恢复带动再工业化兴起和发达国家工人运动促进了社会福利与劳动力成本/环境保护压力上升,促进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消解了西方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压力。老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列强纷争的世界秩序在“二战”中解体,双寡头地缘战略形成。

同期,借资本主义国家深陷“二战”之机,全球反殖民化运动产生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既成为战后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载体,又带来对外负债过高、被迫让渡主权和资源,以及财政赤字增加、对内加剧剥夺和引发社会动乱等复杂困境。

第三次始于资本主义晚期的金融资本扩张——到1990年代基本完成了产业资本转移的西方国家,最近20年正在演化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于是,全球强权政府通过加快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获取制度收益,导致后殖民化时期的地缘战略向币缘战略演变——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对抗性冲突成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主要矛盾。

同期,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受了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与劳动”本质上属于对抗性冲突的主要矛盾,及工业化派生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不仅成为西方资源的提供者和产业资本的“打工者”,而且其外贸盈余向西方资本市场再投资,也成为金融资本经济泡沫化的主要来源。

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是问题,但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

而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现代制度,主要源于国家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我们只不过强调了任何现代制度的派生特性。因为,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是战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在“二战”后才成为了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因为战争的教训,大都在追求国家富强。然而,他们的榜样是前宗主国;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制度就都不可避免有照搬宗主国的困难,主要体现在议会、法院、学校、军队、警察等上层建筑的制度领域。

然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工业化发展时期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本极度短缺”。因为工业化本身就是个内生性地不断追加资本的过程,亦即资本增密是工业化的内在机制。于是,凡是想加快工业化的国家就都会构建追求资本的制度,那些照搬宗主国制度的政府也势所必然地

都有“亲资本”的政策倾向。对此我们一再指出: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势必面临资本极度稀缺的实质性挑战。于是,不论声称何种主义,不论坚持何种体制,内涵使然地都具有亲资本的派生制度特性。

并不是意识形态不重要,我们只不过是重申了意识形态不得受制于经济基础和派生于上层建筑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据此可以归纳出的经验教训很直白,也很无可奈何:如果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及其制度体系不仅超前于、而且不利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就会因这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跌入发展陷阱,很难爬出来。

由此可知,政府内在地亲资本,乃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因资本短缺又要工业化势必采取的政策倾向。然而,“二战”过去很久了,能靠着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体系来完成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很少。

西方人于是提出“金砖四国”;但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其中的俄国本是参加“一战”这个典型的西方战争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本来不应该列入“二战”之后获得发展的新兴国家。何况,若以是否完成工业化为标准,那在亚洲只有中国;在拉美只有原住民占比不足 3% 的巴西。

更值得中国人做比较研究的,是世界第二大的原住民国家印度。其工业产值只占 GDP 的 30% 左右,和城市人口占比差不多;即使已经进入新世纪,还不能算完成了工业化。很多中国学者都说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占比很高,提前实现了经济结构高度化。确实,印度三产比重高于 50%,因此有人说印度比中国先进。但很少有人看印度的三产是什么:服务海外为主。

这与其历史高度相关——英国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于 1840 年发动鸦片战争,以国家直接犯罪为手段强迫中国开放毒品自由贸易,随之就追求“规模效益”而需要大量开辟鸦片种植园;于是,1852 年英国进一步扩大国家犯罪占有毒品收益——派出皇家军队在南亚次大陆东征西讨,配合其政府垄断的“国企”东印度公司统一了印度。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印度,还是个次大陆地理概念——500 多个小邦、几千种语言;被迫由英国人统一之后,只能全国推行英文。

印度 70% 以上的人口在乡下的传统村社或部族社会,其中超过 1/3 的人口是无地农民,还有大量流入城市的穷人生存在大型贫民窟,这种城乡贫困使得民间认可的贫困率占比高达 50% 以上。印度自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最大贫困国家”;其一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了非洲和拉美的贫困人口总和。这也导致印度知识分子无法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窟人群提供服务,贫民窟的灰色经济也不产生可分配收益和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如果第二产业不发达,就更用不了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愿意这样客观地看,印度产业结构高度化内生的问题就解释了。

当代印度国情是:由于国内产业不发达,受了英语为载体的高等教育、符合西方人力资本要求的印度人可以低偿地为西方提供软件、电脑维修、信息咨询等 IT 业服务,以及医疗、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服务。当然,这些服务大都难以对内。

诚然,印度通过“外向型服务业”形成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事实,对于比较发展研究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当代高等教育大都参照结构高度化的西方教育体制来搞,也就大都会内在地具有使其国内知识分子服务于西方、倾向于西方的特点。

二、经验分析:中国在世纪之交的战略调整

那么,什么时候政府才能够改变亲资本的模式呢?如果按照以上分析给出的逻辑,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调整了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呢?1999 年,因为“生产过剩”。所

以在1999年,中国的执政党有了重要的新提法:以人为本。

早在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造成中国出口下降的时候,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马洪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产业过剩的历史阶段。1999年中年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指出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劳动力过剩与生产过剩,二者互为因果、高度相关,劳动力过剩价格下跌,就会内需不足,恶化产业过剩;这样,双重过剩,恶性循环,本是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失灵,靠市场自身没有好的化解方法。那一年他就提出政府应该启动国债投入新农村建设,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恶性循环才能解决。

大家要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质性的变化: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是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西方体系遭遇这个矛盾的时候,发生的是世界大战——用战争来摧毁过剩的生产能力。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有寄生性、腐朽性?因为不可能解决这种一般矛盾。其实,中国人遭遇到这些矛盾的时候,试图寻找西方哪个解决了的案例;其中,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时针对生产过剩研究了罗斯福新政的实际作用,当时他们就指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根本上缓解危机,最后还是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创造的战争需求化解美国的危机。

1999年中国的生产过剩怎么化解?客观地看,作为一个超大国家,过剩的规模和性质,绝不亚于193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生产过剩。认真看数据会发现,1990年代后期,中国制造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过剩是显然的,我们的大宗商品都是过剩的。我们有的只是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矛盾。那么,中国使用了西方化解矛盾的办法了吗?为什么没有呢?

当时的政策部门,并不受制于海外政客和媒体们高度关注的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结果是:1999年以来的10年间,中央政府用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增长和就业,基本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当然也派生了很多问题。

其一,1999年启动西部开发、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高速公路三纵两横,这些总计2万多亿国债,五年投下去,带动基础建设投资超过3万亿,使得中国政府换届时,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大国。不过,西部开发虽然有效,但这个过程难免产生大量坏账。

其二,2001年提出振兴东北工业基地,国债投资1万多亿,缓解了东北的资源枯竭城市和产业升级设备换代城市的转型困境。国务院成立了东北办,与西部办作为设立在发改委的两个副部级单位直接操作大规模国债投资,在1998年之后的这一任政府领导下,合计投了3万~4万亿基本建设。前可继承罗斯福(西部投资、市场停摆、国家发券),后可连接奥巴马。

其三,2003年,温家宝政府上任伊始,政策上算是“朱规温随”,实际上是以“中部崛起”名义增加了大约2万亿国债。

其四,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5年来投入了约3万亿。

其五,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投入了约2万亿。

这样,温总理第一个任期国债投入共约7万亿,几乎两倍于上一任。如果把2009年提出4万亿救市再加上去,他这两个任期总共有10万多亿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约三倍于朱镕基时期。

诚然,这种短期的大规模国债投资,也势必派生很多问题。

一是导致中国出现了特别值得圈点的长期的“投资拉动”增长: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带动的增长至少占GDP的3个百分点,某些年份会高于3个百分点。一般人都知道应该是“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为什么我们总说不平衡?因为,驾辕的本来应该是内需,但内需是长期上不去,驾辕的只能算是瘦驴。可是,拉套的却是骏马。诚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任何一项经济政策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创造新的问题,经济不平衡是肯定的。

第二,国债投资是未来的税收被当期的政府预支了,性质上应该主要是公共投资。那就应该是公共部门操作,不可以交给私人部门。于是,代表私有经济的批评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公共部门得

到加强,为什么大型国企、垄断部门占比上升?私有部门及为其掌控媒体的意见很大,同期出现了中产阶级资本家精英群体代言这种不满,社会上批铁道、电力、石油等垄断部门,一浪高过一浪。

民营经济相对于国家资本有所弱化,这是客观结果。既然这十几年用十几万亿元的国债拉动增长,那就要问,这种主要投资于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结构能不能改?能不能说从1998年增发国债就搞错了?

2008年美国也靠增发国债缓解美国危机,而且是国债和货币两手增发,使用增发的货币购买增发的国债,客观上构成了向全球转嫁通胀的特殊政治优势。而欧盟做不到,其对外转嫁债务危机制造通胀的能力就比美国差了很多。欧洲债务危机为什么这么困,因为欧盟不是国家,不能发行欧洲国债:欧元区各国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现统一货币,但是却不可能统一控制各国政府发出的国债,于是债务危机蔓延。欧元区政府债务普遍超过占GDP的60%以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变成了垃圾债,只能求助于欧洲央行和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此前IMF资金的70%已经早就都投到欧盟国家了。

中国和西方比较,2009年全球危机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性考验——只有中国经济下滑了仅一季度,第二季度就开始反弹,因此现在很难做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各位不要用一般的西方价值判断看全球形势,应该把思路打开,把价值观先放一放。我在很多国际场合演讲都强调这一点,要站得比意识形态更高,超越价值观,才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条件。

三、历史经验:西方不同于中国的历史演进轨迹

对于发展理论,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比如,我2008年曾经在联合国与杰弗里·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同台介绍中国经验,他们对中国的分析虽然粗糙,但其中有的观点让我很吃惊。众所周知,萨克斯是以在苏联推广私有化改制著称于世的。但萨克斯在解释中国经验的时候,认为人们应该从集体化时期的经验入手。而斯蒂格利茨就更有意思了,他认为“恐怕得从中国土改说起”。假如说,斯蒂格利茨的说法可以理解,因为他上街公开支持群众占领华尔街运动,算是左翼学者。可萨克斯为什么也说得从集体化时期入手才能理解中国经验?我问他,你的观点似乎与过去有所不同,他回答说:作为学者首先不是强调自己观点正确,而是对客观现实是否尊重。希望各位多少借鉴一点萨克斯的自我反思精神。

当讨论全球资本化与制度致贫的时候,有些属于对历史经验的不同归纳。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起到构建制度文化基础作用的文艺复兴功不可没,可有谁想过要质疑:复兴的是什么文明?

早年我也是个文学青年,看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人大复校以后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老师介绍了大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以至于后来我成了个博物馆迷,非常推崇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但当我开始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时候,越多接触原住民文化,就越有了另外的批判性认识,在此提出来和大家共享——其实与文艺复兴同步的是殖民主义扩张,文艺复兴中的很多艺术、文学或隐或现地包含着对西方几千年奴隶制的复兴等等。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古罗马市民的民主制度的基础,都是对外军事扩张与掠夺伴生的奴隶制。其中,享受民主的市民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0%,与现在的黄金分割二八开相比都差远了,而另外超过90%以上的人口都是奴隶。

古希腊奴隶劳动创造的文明很伟大,但在那些巨石雕塑前被震撼的时候,应该看到其中几乎没有大量投入的劳动者——奴隶们的身影;应该想到这是古代希腊人在上攻到波罗的海一带使其奴隶贸易扩大了十几倍之后才有的奴隶劳动成果。对有口皆碑的古希腊历史来说,最大的伟绩是马

其顿城邦首领亚历山大的伟大东征 在于他打败波斯之后把边界向东扩张到印度边沿,由此成为跨欧亚非三个洲的大国,这也进一步扩展了古代希腊奴隶制,于是有了辉煌的文明时代。

古罗马一样是在奴隶制基础上形成的城邦文化,而且他的城邦文明是希腊的血脉传承。因为,罗马是早期希腊海盗占领的据点演变而来的城邦。海盗据点主要贮藏财富、烈酒和妓女。于是,有了今天人们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还可以到处看到的关于“吃狼奶长大的双胞胎”的多种艺术表达(据说已经被意大利最新考古发掘证实了)——他们本来就是妓女生的孩子,一般都扔到河里死了就算了,但这对双胞胎却没被淹死,他们被失去狼崽的母狼哺乳养大。

在罗马的国家博物馆随处可见的还有一个用陶器、壁画和挂毯表现的抢女人画面,吃狼奶长大的男婴成为罗马居民的时候,这个城市只有男人,其实这是海盗文化的传承——早年的海盗只有男人。那么,怎么解决男人问题呢?就到另外的部落抢女人做“媳妇”,于是就终于有了罗马城。

这个古罗马成为城邦文明的过程,造成了多少其他部落的“杯具”……

类似的例子: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代表政府多次向原住民道歉,原因也是早年来到澳洲的白人大部分是属于罪犯流放——几乎没有女人。政府就下令当地所有土著家庭贡献一个13岁以上的闺女,交给政府培训之后分配给上岛的白人;于是,也就有了澳大利亚成为国家的人口基础。

早期的西方文明,确实和后来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文明有很大的继承性。后来的文艺复兴在对中世纪农奴制表达批判意义的同时,内涵性地是对欧洲早期奴隶制的复兴——殖民化时期是欧洲继承古罗马的国家犯罪造成的对人类的屠杀、迫害和对资源的掠夺、控制。

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内含成本对外转嫁的外部性制度构建。而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是所谓后殖民主义继承原来殖民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的延续,也是原有利益集团转嫁制度成本的结果。

据此,不妨再看到底什么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各位可以讨论一下。也许可以检验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经得起不同的经验过程的实践检验。如果任何一种理论的逻辑起点不能和其表现的历史起点相一致,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不过,我们今天教科书中的大多数理论逻辑,都找不到与其逻辑起点相一致的历史经验的起点。

如果愿意进一步讨论东西方文明的演变,就会去价值化地看人类历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全怪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在殖民化中复兴奴隶制。因为,西方文明之所以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取决于人类在不同生产关系下受到的环境约束——文明的形成及其延续与自然地理高度相关。

大约在中国从炎黄两帝到夏商两朝时期赶上气候变暖,东西方人类社会发育都明显加快;但最早的气候变冷(小冰河期)大约是在距今2000~3000年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演化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地域冲突——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气候变暖期间,亚洲大陆400毫米等降水线北移,华夏农耕文明已经扩展到了北方;气候转冷等降水线南移,干旱草原游牧民族的所有部落都生存困难,遂有联合南侵;华夏农耕文明就和北部游牧文明的各种民族之间出现了频繁战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战争很大程度受到自然因素和资源环境变化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冷和北方干旱引起的频繁战争,导致秦汉完成中国大一统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击匈奴于大漠以北”。这也许客观上成了罗马灭亡的原因之一。被汉武帝打败的匈奴残部西进到欧洲,那时候欧洲东部和北部的原住民大多处于采集和渔猎状态,抗自然风险能力极低,匈奴铁骑压迫那些处于半原始状态的部族只能向西和向南迁移,北部的日耳曼人进入亚平宁半岛,那就是欧洲历史记载的所谓“北方日耳曼蛮族”的南侵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只不过,这是个至少百年以上的漫长传导过程。

但西汉征伐匈奴间接影响古罗马只是汉唐盛世影响西方文明的第一段。唐朝是第二段——先后击败东西突厥,残余突厥人沿着中亚进入小亚细亚,部分定居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中部,其一小部

分继续西进,曾经打败了东罗马的衣钵传承拜占庭帝国——也是间接导致拜占庭帝国解体的原因之一。

据此,虽说我们的中原农耕文化“安土重迁”从来就没有威胁过西方,但被中国汉唐盛世两次打败的游牧民族西迁,确曾对西方有过一些负面影响。

到了两个罗马相继灭亡之后,欧洲进入“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半岛主体部分那些高度分散的蕞尔小国,连维京海盗都应付不了;至今找不到多少历史文物或者文字清晰地表达这个时期的真实历史。

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宋代——政府治理和文官制度最完善的时代——形成了三权分立的中央集权和科考取士的文官制度。

宋代科技文化和工商业繁荣,是当时世界最发达国家。其对外贸易盈余显著增加——主要靠海运瓷器出口;运到阿拉伯世界,不仅靠转运中国货带火了阿拉伯,也搞穷了中世纪的欧洲那些小贵族们建立的小王国。

我曾在欧洲到处走,看到很多的中世纪小城堡遗址,那些小土豪手下管着几百户人就算是个诸侯了。那时候的宋代则是大船出海,回来“十船九空,唯一船实之白银也”。欧洲白银外流普遍危机,长期战乱频仍;欧陆边缘的战败国要用白银赔偿,战胜者则更要买中国的东西,于是战败者去了盛产白银的南美。

宋明之际,中国的白银储备几乎占世界的 60%。这个基本上不产银子的国家,凭什么用白银作为货币?因为大规模贸易形成的长期盈余。

过去是“弱国无理论”——因为被西方列强打败了,就被西人编造说:中国之所以战败,主要是人的素质低,加上自己制度不好——长期封建主义“闭关锁国、落后挨打”。非得生搬硬套么?从秦汉构建大一统的制度努力直到宋代,中国人用了差不多上千年,才完成了对诸侯分封或节度使割据等勉强与西方特色“封建主义”沾边的制度改造,形成维护中央政府法统治理的国家政治——这至少已经不能再算是根据西方惨淡中世纪历史所指称的封建主义了。

1840—1870 年,鸦片战争之后大约 30 年,帝国主义多次侵略,中国政府就把财政赔得差不多了,同期官员和军队大都抽鸦片,上层建筑就“被鸦片化”了,中国就成了弱国。而且,1870 年之后,由于国家财政失效了,中央政府不能给地方正式税银支持开支——就像 1990 年代中央财政严重亏损不足养官而导致地方乱收税费的状态,清朝中央政府就允许地方征收“厘金”。交不起的老百姓就造反了,于是到处是农民起义。

总之,西方通过殖民化吹响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之前的序曲,这确实与中国有关——是其对华贸易的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财政危机、引发长期白银战争,才有对美洲白银产地的殖民掠夺,以及进一步对非洲的奴隶制掠夺造成的三角贸易……就是这种掠夺全球,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四、战后双寡头地缘控制下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如果说,“二战”之前是西方产业资本过剩大危机压力之下列强不断瓜分殖民地和市场的纷争构成的多边地缘格局;那么,战后,则演变成了美苏双寡头为实现地缘控制战略而推进的产业转移。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把借“二战”机会大幅度扩张起来的过剩制造业向欧洲和日本转移;这就有了美国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同期,俄国也向东欧和亚洲的中朝印等国家做类似的雁阵式产业转移。

战后产业转移进程中,欧洲得到设备恢复生产,产品给美国,美元回流给欧洲,到了 1960 年代就有了与滞留在欧洲内部流通的美元相类似的大量的海外美元,比如有石油美元、毒品美元等。海

外美元的大量沉淀导致美国人不再允许那些拥有美元的外国投资人随时来换黄金,于是就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战后的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本来使得美国已经成了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但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该体系解体之后就必然地导致了无储备约束的各国货币滥发。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也势必走向符合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客观需求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客观地说,只要金融资本连续脱嵌于产业资本和社会大众以追求流动性获取独立利益,其导向就是加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必然的寄生性:内生地具有强烈投机特性的金融资本越是追求超越产业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越是具有其腐朽性和投机赌博势必导致的垂死性。一旦资本投资人可以靠玩票子挣钱,谁还愿意来千辛万苦地做产业?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搞产业的人一定会吃亏。金融市场的愈益混乱也是一定的。因为,金融资本不再具有产业时代资金要素的性质,不再满足资金要素追求的产业平均收益率,而是由于追求流动性创造的超额收益率,那就势必去制造越来越多的衍生品。

五、东西方差别:苏东金融体系坍塌与西方金融全球化危机的不同结果

当代发生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第三次危机——金融全球化危机。

如果只认识到这是个资本主义历史的阶段性危机,那并不具有创新性;认识到这种危机代价仍然向弱势群体转嫁、以及怎样转嫁,才是我们的理论创新。

大家都知道,因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竞争依托权利增发货币,而势必导致金融资本泡沫化危机!但美国面对金融危机仍然得靠更多增发货币,由此发生了连续的金融危机。

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住在华尔街附近,高档餐厅照样顾客盈门,接触的那些投资家趾高气扬,一点危机的感觉都没有。2009年希腊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也去了,感觉也是这样的。2010年西班牙危机、2011年爱尔兰危机;除葡萄牙之外的“PIGS(俗称笨猪国家)”我都去了,感觉也还是这样。虽然偶尔也看到有些群众上街游行,但总之,我在那些危机国家中直观的感觉,的确不像是身处危机之中。

派生于西方政治强权的金融资本泡沫化危机的结果,的确不像1990年代初期的苏东政治危机与金融解体。

1991年苏东国家解体之际我自费去做考察,看到危机后果相当严重,政治改革造成政权解体的同时是货币体系坍塌;留下巨大的物质资产被西方国家来推行“货币化”获取超额利润。恰因苏东国家金融体系坍塌给了欧共体直接覆盖苏东推进货币化、扩张西方金融资本的历史机遇;欧元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了。

因为,苏东战后靠实体经济起步。其中,靠非货币交换的“经互会”记账流通体系可以节约资金成本。由于长期易货贸易在交换中不使用货币,因此苏联的卢布币值高于美元也是因为没有推进经济货币化,苏东国家的货币连一般商品等价物的功能都没有实现。这与1992年之前的中国是一样的。又因为苏联作为主导国家在易货贸易中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必推动货币化就可以实现苏联产业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占有这种制度收益的苏联产业资本集团就不会推进经济货币化。于是,苏东国家就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

同期的美国则大规模推进对外产业转移,主要靠货币增量和经济资本化维持增长,遂导致到1980年代符合西方需要把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改成了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这样西方的非实体化的经济就显得更合理了。因为,在1970年代没按GDP核算的时候,大家都承认苏联创造的实物量和工农业产值更高,但是改为GDP核算就使得西方经济增长明显地快于苏联东欧。这样到了1980年代形成了国际主流舆论:苏东落后了。而西方

世界被认为是制度先进赢了。其实,停留在产业阶段的苏东国家的产业资本被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西方击垮了。

不过,这乃是双寡头地缘战略冲突之下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类型矛盾的结果,苏东经济体是比较典型的产业资本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

这个苏东巨变西方得利过程使我理解了金融体系之信用的依靠,本质是政治强权。货币是什么,不过是一张纸,那么货币之有信用在于是政治强权向其信用体系的赋权。政治强权塌了,货币体系也会随即坍塌。

由此可见单极化强权政治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一定会更加依靠政治强权导致危机代价的转移。比如,连续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已经把制造出来的 60% 过剩货币通过冲击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场转嫁给国外。因为美国民间和官方的债务超过 40 万亿,政府和民间都根本不打算偿付巨额债务。

发达国家债务占比大幅度提高,因为他们的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

1980 年代我到美国看到里根政府调高利率,一方面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另一方面不断推出吸纳大量投资的更多衍生品。可见,金融全球化的过程,应该是货币化先于资本化,资本化扩张则更多靠增加金融衍生品吸纳过剩金融的规模交易。何况美国从 1990 年代苏东解体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单极化的政治强权,无论怎么向世界转嫁成本都没有“合格反对者”。

大家认同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我把现在西方发生的危机称为“西方特色的现代化的综合成本过大”。由于把产业转移了,那么看英国第一大产业是金融,第二是旅游,都属于第三产业,制造业和农业几乎没有地位,只靠金融旅游怎么过日子? 如果谁是英国领导人,一定坚定站在美国大哥一边,才能保证英镑币值长期高于美元,对其他国家占有汇差,以便靠进口过日子。

事实上,在经济危机打击下改变西方人消费主义生活习惯和压缩福利主义的社会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客只能承诺增加既定的福利开支,不能妄想在社会成本不断增加条件下恢复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当年奥巴马把“改变”当成口号,但是上任几年没成功,因为他们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就是那样的。只剩下了制造货币增发国债。再比如,希腊的造船产业和航运业都转移出去了,中产阶级都要高福利又不事生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靠玩金融,于是只能做旅游,靠的还是奴隶文明时代打造的几个神庙。所以,如同小资产阶级一样,中产阶级是个不清晰的概念,既不可能是自觉的阶级,也没有统一的政治诉求,利益结构还高度复杂,其实只是西方产业转移后留下来靠海外汇回资本收益维持生存的人。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下的中产阶级福利要求的泛政治化表达,哪一个政客不能满足就当不了政客。谁都不会冒着政治不正确的风险把自身问题说清楚,那些越来越没底的国际会议只好把我这样的外来和尚找过去揭他们老底。

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走到今天,引发了金融全球化巨大成本转嫁不出去的西式现代化危机。过去累积的成本向发展中国家和环境转嫁,终于反过来惩罚自身,就变成了现在发生在西方的矛盾。连同地中海对岸北非发生的事情,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应该是人类愿意建立进一步反思能力的时候了。

早期西方大规模转移人口和占有资源是构成世界二八开的前提。当代形成政治强权支撑金融霸权是维护世界二八开的前提。

六、生态文明:中国地方化体制下的激进现代化困境和方向调整

不仅与苏东国家危机不同,西方遭遇危机的处置,也完全不像中国在 1990 年代中期财政、金融

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引发的大危机;那时候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的综合债务对GDP的比例超过140%,那可比当前欧洲四国还严重。当时美国人对中国非常不屑,更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提到“救助措施”。当时我们在国外遭到的挑战,几乎都是中国崩溃论。

这种歧视一定程度上在于西方意识形态认定中国是集权制。但从财政税收结构看,中国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更多时候在经济和政治上搞的都是“地方化”。但地方政府实际上不承担金融风险和投资损失,那么,风险责任最终只能由中央来承担。现在的重庆经验属于“中央缺位下的地方创新”。

政治上的地方化第一个派生的社会现象,是地方攀比追求工业化收益而同样不承担制度成本。

当西方把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其内含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就转移过来了,于是转移了产业的西方国家,出现中产阶级兴起和民主政治扩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就被放弃了。接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就成了主导矛盾。然而,中央政府仍然使用传统意识形态无法解释干群对抗,遂使财政用于“维稳的成本”大幅度上升。

前不久我在广东讲课时候说,2008年南海区连续发生成规模的打工者有组织的罢工并取得成功,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了经典理论描述的对立矛盾引领社会结构变化的里程碑。

第二层的派生结果是西方转移产业使得地方政府促进形成了更多亲外部资本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形式。

因为,西方一般是把旧设备和旧型号高价淘汰给发展中国家。于是,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形成外债、欠债国家在西方压力下的国内上层建筑因此产生了转轨和改革,从原来亲内资变成了亲外资等;这在不管何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现象。在中国,也是地方政府在推动国家创造良好的“亲外商”制度环境。各位注意,本国在最近两年才多少改变了长期亲外资的政策。此前,国资收税超过50%,民资33%,外资仅14%,何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现在虽然统一所得税率33%,但是地方化体制下的政府仍会主动减免。

从1999年以来国债投资大规模增加的结果,是国有垄断资本的加强,对于民资确实是不平衡。但同期大规模引进外资则意味着地方政府更多亲外资。外资要是没有相当高的回报率是不会来的。例如,1990年代美资在中国的回报约为20%,中国在美国的国债市场投资是不足6%,现在在美国高达33%,中国下降到不足4%。客观结果是,听任外国拿走中国的贸易盈余,反过来再投资到中国控制战略产业并且占有高回报,这也是多年亲外资政策所派生的客观结果。

随着西方产业大转移,出现了这些派生现象。西方把产业资本过剩造成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如今,中国在生产过剩压力下的主要矛盾也会在国内表现为爆发趋势。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很多,要到全球去买资源和原材料,就会被西方为首的话语体系批为新殖民主义!其实我们像“土大款”穷得只有钱了,资源是买不到的。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与以往提法有继承性。1980年邓小平提了两个文明,1997年十五大承认“资本”之后江泽民提出“政治文明”,今天提了生态文明,演进为四个文明。不过,合并同类项我们发现政治文明可以放在精神文明中,生态文明也可以放在物质文明中。那就是“生态化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化的精神文明”。

当年“一切向钱看”的时候,中国经历了“去政治化”和“去生态化”。现在当人们发现社会矛盾愈益复杂,去政治化挡不住自发政治化,精神文明也不是墙上挂了“八荣八耻”就文明了。何况今天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了。

1949年以后的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强调过:“我们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立社会主义”——土改的结果造成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不过实现了农民几千年诉求的“耕者有其田”,但为宣传动员将其解释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又因为土改使包括农民在内的小资产阶

级占中国人口的大约 90%，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发生的经济政治领域矛盾，不过是小资短视、利益诉求过多和小资激进却并非“自觉阶级”的复杂表现，无论张冠李戴地说这是什么主义，都只是对西方话语的一种借用。

如果说土改派生的经济效果，是把 90% 的农民从民国危机的长期通胀中解脱了出来，相对于城市资本而言，可以叫做“去依附”——中国的土地革命使得 90% 的农村人口与城市几乎没关系了，而城市孤岛当年主要是高风险的资本主义经济。

回顾民国史可知，1920—1930 年代是民国追求现代化的“黄金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但为什么短短 10 年就完了？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遭遇了 1929—1933 年西方大危机，西方 4 个承担稳定白银价格责任的国家不得已放弃了白银协定，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和通货紧缩，就像中国在中世纪曾经导致欧洲白银外流通货短缺一样。于是民国工业化中断，政府不得不在 1936 年放弃银本位，改为发行法币。接着，第二年日本侵华，迅速转为通胀，政府更需要支付硬通货买军火……延宕到 1948 年法币崩溃，贬值几百万倍，这时民国经济也接近崩溃，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借来美元发行金圆券，仅 4 个月就垮了，维持国家的现代财政和金融没了，于是乎庞大的国军没军饷了。民国先灭亡于现代化的财政金融体制的失败，后灭亡于无军饷之军队的崩溃。

新中国初期土改就让大多数中国人和这套西式现代化体制脱钩了。那么，到底什么要素让中国改出民国长期危机转而进入高涨？

人类从“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文明转型的方向，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内涵是多样化的人类客体的共存，无所谓好坏，也没有谁一定得“化”掉谁的道理。

七、自我反思：认同生态文明的学习过程

最近 10 年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不强调城市化了？因为城市中国是个资本池，风险收益与制度成本都很大；乡土中国则是“人口池”或“劳动力池”，风险收益和制度成本也低。在生态文明理念之下，城市和乡村的存在，各自都有其合理性，不一定非得要谁化掉谁。

现在说的城乡统筹，应该注重的方向是公平地给城乡共同分享的财政支持：养老、福利、教育、医疗……干嘛都得像城市那样去搞高成本的现代化？有人如果愿意低成本地“传统化”一点，难道就不行么？

我现在到了人生耳顺的甲子年，学什么都觉得有道理，谁批评我都笑眯眯地接受。也许因为批评者大多没有我的那些经历……1978—1979 年我参与平反改正落实政策工作，主要任务是写右派平反报告，由此就有机会详细看了 158 份右派档案，发现当年的很多右派其实是左派，而那些打击“名右实左”派的人却是极右派。1980 年代我到中央机关工作，跟着当时在单位当研究员的老副总理纪登奎下乡，他谈了很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亲身经历，但不许记录，也就不可能做口述史。这两个情况都纯粹是偶然的会。

在那些右派中有个人曾经被当成托派受到批判，平反之后他介绍我看了一些托派的东西。这才多少知道中国当年的托派知识分子是希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把马克思晚年对亚洲形态的反思吸收了。当年中国人是在现代化婴儿时期引进西方思想和在青春期躁动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出全盘西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产生严重教训，特别是在 1930 年代搞城市工人暴动的时候，中国工业人口还不到 5%，城市暴动失败是必然的。于是有一批知识分子痛苦反思，分析西方给我们的思想材料，最强调的就是马克思晚年的自我批评。但中共在陕北需要重建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就得接受经斯大林改造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于是教科书就说五个阶段论对于中国的历史是一样的。而这以前关于奴隶制是否在中国历史存在一直就有着长期争论；在这些人被打成托派之后就

没再争论。人大复校后,也有老一辈教授给我们讲了类似的道理。

总之,马克思的亚细亚形态之说是值得我们再认识的。很难说马克思能超越西方的文化氛围。我们花了一百年推行西式激进主张,各种朝代和不同派别几乎无意识地在崇拜西方制度,虽然并不一无是处,但都值得讨论。今天人们为什么对问题认识不清楚?在于意识形态局限。媒体很难超越,主流的西方理论包括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等学科构建基本逻辑,在中国大都找不到历史起点。

我分析周期性经济危机最早的文章是在1988年《经济学周报》发表的、被《新华文摘》转载的《危机论》。1991年在美国写的文章也比较早地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1992年改出了中文版的《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但在国内没哪个刊物敢发,到了1993年一个朋友的刊物斗胆刊登之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此后,到了1997年的十五大我们才公开承认资本这个概念(1997年之前国家级报刊是不讲资本的)。

后来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调查研究逐步认识到,即使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分析,无论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符合西方理论的内涵。如果上层建筑长期超前于意识形态,后果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上层文件不是大家不执行,是它本身超越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各国都有上层建筑成本高的问题。

西方在转嫁成本,我们搞工业化城市化也在转嫁;只不过,中国是大国才有足够的危机承载能力。什么大国?几百万农村共同体包容的农民大国。于是,历次城市产业资本出现经济危机都是向农村转嫁的。我发现,当代史上凡属于能向三农转嫁的危机就在城里软着陆,凡是不能转嫁的就硬着陆。

因为,城市是资本池,有风险收益,农村是劳动池,土地集体分配就是小农零风险资源性资产,而小农是风险厌恶的,这就是小农村社共同体具有群体理性的基础,使其能够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可见,为什么乡土社会能够承载城市的资本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其具有这种内部化机制。

我们1990年代以来对西方个体理性有了认识,但却对中国乡土社会中维护村社共同体的群体理性缺乏认识。因此,这种村社内部化机制正在被各种维护城市资本利益的激进改革破坏掉。

当前农村实际上已经大部分是非规范制度的“三宗”治理——宗族、宗派、宗教。很多农民上访的背后也有复杂的三宗背景。如今的农民已经不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了。现在做点什么事都得找三宗这种非规范组织沟通,否则寸步难行。自上而下设置的村镇党委和村级支部这些正规组织由于成本过高而没有大用。在长期刻意在农村执行去组织化和去政治化政策的条件下,任何构建现代上层建筑的努力都遭遇制度成本高而难以落地。

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充满城乡关系的复杂矛盾。城市产业资本1950年代就要求以乡为单位实行规模经营,便于提取三农剩余。在1953年工业化加速的时候搞了统购统销,几十万个合作社,完成的是从“满头乱发”到“编成辫子”、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1956年以后的高度集体化可以形成准军事组织,成规模集中劳动力,以替代稀缺资本。这个替代机制很重要——“L替代K”。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中国在1957年几乎是零资本——苏联撤资后,工业化难以为继,1958年中央没钱投资了,随之发动地方搞的工业化就是后人批判的“大跃进”。此后靠国内力量启动二次工业化,主要是用规模化的人力投入代替零资本。接着,不仅中央没有钱,地方工业化折腾了两年,两级政府的财政就全面赤字,累积达到1960年当年财政的大约28%,贷差超过50%。到了下一年,中国变成了几乎是零投资国家。于是,整个1960年代中国都非常贫困。1958年人民公社的重要作用是吸纳城市的工业品以拯救陷入困境的城市经济,公社自己还得搞五小工业,建立拖拉机站。集体还得组织劳动力去国家的工地替代资本。这些就是中国自力更生进入工业化的方式。后来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了,政府收益主要来源于城市工业,就从农业退出,集体化就制度转轨了,农村大包干,分散了土地和劳动力。

1980 年危机爆发导致约 40% 的城市失业率,当时主要靠“单位制”解决——政府要求 5 个人的工作 10 个人干,从此出现了单位制的无效率,因为政策要的就是没效率。同期是干部子女在父母所在的政府部门“办三产”:官方恩准干部子女办公司倒买倒卖,使得 1980 年代中期物价飞涨,市场秩序严重混乱。当时为了缓解通胀做了个全面改革的大计划,还好没有实行;虽然并不是不想用市场手段。最后邓小平决定价格闯关可以试。还没来得及闯,就出了大抢购和恶性通胀。

1991 苏东解体,部分归因于苏联人比我们的全面改革计划先走了一步。这样,我们接受了他们没有及时推行货币化的教训!于是,中国在 1992 年进入了货币化——取消一切票证,中国从 1992 年终于有了真正的货币——但那恰恰是由于在严重赤字危机条件下政府实在无力负担票证分配的财政补贴。

此后出现货币发行量陡增,信贷翻倍。政府为了吸纳超发货币,又在 1992—1993 年开放了三大高风险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这就顺理成章地启动了资本化。其代价是“三大赤字”爆发:在 1993 年三大风险市场同步放开带动高增长,进一步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银行资本金为负(银行财政不分家,财政还多吃掉了 80 多亿存款);以及外汇储备不抵债务偿还需求等。

于是,1994 年 1 月 1 日两大宏观调控出台:人民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 57% 和力推“分税制”。当年就出现 24% 以上 CPI 标示的高通胀。政府于是再进一步转嫁危机,要求国企“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数千万企业职工下岗失业的客观结果是导致内需大幅度下降。随之依靠外需,在对外依存度 3 年内疾升到超过 70% 的时候遭遇 1997 年东亚金融风暴带来的外需陡然降到不足 GDP 的一个百分点。

从这时候起,中国遭遇输入性危机为主的阶段——1998 年到 2008 年,我们已经遭遇了两次输入型危机。

最值得对比的是中国 1988—1994 年的危机周期,类似 1929—1933 年西方大危机。我会出一本书归纳新中国的 8 次经济危机。其中表述的一个道理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和资本化。今天也如此。例如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越是下级政府负债率越高,最多高达 400%,这些债务最终责任都是中央政府承担。现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占 GDP 的 50% 以上。但如果按照西方承担全部社会开支的现代化政府职能来计算,潜在总债务占比则超过西方。而中国各级政府不同于西方的生产性融资更客观地体现资本内化于政府,因此才是运动员而不可能是单纯的裁判。这和上文述及最近 10 年政府直接投资拉动增长是一致的。虽然招致了西方和国内民资的批评;但有延缓中国爆发危机的时间、拓展增长空间之客观作用。

任何一个意识形态条件下的经济体,都有形成自身经验归纳的客观规律的可能。我今天表述的是我们归纳东西方经验之客观规律,乃是一家之言。

(责任编辑:常 英)